



China and World in

Liangzhu Era

良渚时代的
中国与世界

陈明辉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陈明辉
著

良渚时代的
中国与世界

良渚文明丛书

Liangzhu Civilization Series

China and World in
Liangzhu Era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良渚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 陈明辉著. —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7 (2019.8重印)

(良渚文明丛书)

ISBN 978-7-308-19190-6

I. ①良… II. ①陈… III. ①世界史—古代史—研究
IV. ①K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05529号

良渚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陈明辉 著

出品人 鲁东明

策划人 陈丽霞

丛书统筹 徐 婵 卢 川

责任编辑 谢 焕

责任校对 陆雅娟

装帧设计 程 晨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23千

版印次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9190-6

定 价 7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ss.tmall.com>

良渚文明丛书编委会

主 任:

柳 河 罗卫东

副主任:

郑建华 刘 斌 鲁东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宁远 方向明 许常丰 李新芳 陈丽霞 赵 晔

总序 Preface

良渚与中华五千年文明

刘 斌

时间与空间真是奇妙的组合，当我们仰望星空，看到浩瀚的宇宙，那些一闪一闪的星星，仿佛恒久不变地镶嵌在天幕中。然而，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光年是距离单位，宇宙深处星星点点射向我们的光线，来自遥远的过去。原来，时空的穿越，不过是俯仰之间。

考古，同样是这种俯仰之间的学问，由我们亲手开启的时光之门，将我们带回人类历史中每一个不同的瞬间。而距今 5000 年，就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

放眼世界，5000 年前是个文明诞生的大时代。世界上的几大流域，不约而同地孕育出早期文明，比如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那么，5000 年前的中华文明在哪里？这个问题困扰学界甚久。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文明标准，城市、文字、青铜器……我们逐一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似乎到出现了甲骨文的商

代为止，便再难往前追溯了。

考古学上，我们把文字之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在中国的史前时代，距今1万年以来，在辽阔版图的不同地理单元中，就开始演绎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序列。考古学上形象地称之为“满天星斗”。然而，中国的史前时代长久以来被低估了。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以夏商为文明探源的出发点，以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无形中降低了周围地区那些高规格遗迹遗物的历史地位，比如辽西的红山文化、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晋南的陶寺文化、陕北的石峁遗址……随着探源脚步的迈进，我们才渐渐发现，“满天星斗”的文化中，有一些已然闪现出文明的火花。“良渚”就是其中一个特殊的个案。

大约在5300年前的长江下游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尚玉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尽管在它之前，玉器就已广受尊崇，但在此时却达到空前的繁荣。与以往人们喜爱的装饰玉器不同，良渚人的玉器可不仅仅是美观的需要。这些玉器以玉琮为代表，并与钺、璜、璧、冠状饰、三叉形器、牌饰、锥形器、管等组成了玉礼器系统，或象征身份，或象征权力，或象征财富。那些至高无上的人被埋葬在土筑的高台上，配享的玉器种类一应俱全，显示出死者生前无限的尊贵。礼玉上常见刻绘有“神徽”形象，用以表达良渚人的统一信仰。这些玉器的拥有者是良渚的统治阶级，他们相信自己是神的化身，行使着神的旨意，随葬的玉器种类和数量显示出他们不同的等级和职责范围。我们在杭州余杭的反山、瑶山，常州武进的寺墩，江阴的高城墩，上海的福泉山等遗址中，都发现了极高等级的墓群。这就似乎将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分割成不同的统治中心，呈现出小邦林立

的局面。然而，历史偏偏给了余杭一个机会，在反山遗址的周围，越来越多的良渚文化遗址被发现，这种集中分布的遗址群落受到了良好的保护，使得考古工作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稳步开展。到今天再来回望，这为良渚文明的确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否则，谁会想到零星发现的遗址点，竟然是良渚古城这一王国之都的不同组成部分。

今天，在我们眼前所呈现的，是一个有8个故宫那么大的良渚古城（6.3平方公里）。它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有宫殿与王陵，有城墙与护城河，有城内的水路交通体系，有城外的水利系统，作为国都，其规格已绰绰有余。除了文字和青铜器，良渚文化在各个方面均已达到国家文明的要求。其实，只要打开思路，我们会发现，通行的文明标准不应成为判断一个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生硬公式。青铜器在文明社会中承载的礼制规范的意义，在良渚文化中是体现在玉器上的。文字是记录语言、传承思想文化的工具，在良渚文化中，虽然尚未发现文字系统，但那些镌刻在玉礼器上的标识，也极大程度地统一着人们的思想，而大型建筑工事所反映出的良渚社会超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也透露出当时一定存在着某种与文字相当的信息传递方式。因此，良渚古城的发现，使良渚文明的确立一锤定音。

如今，良渚考古已经走过了80多个年头。从1936年施昕更先生第一次发现良渚的黑皮陶和石质工具开始，到今天我们将其定义成中国古代第一个进入早期国家的区域文明；从1959年夏鼐先生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学界逐渐开始了解这一文化的种种个性特点，到今天我们对良渚文明进行多领域、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与阐释，良渚的国家形态愈发丰满

起来。这一系列丛书，主要是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致力于良渚考古的中青年学者，围绕近年来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集体编纂而成，内含极其庞大的信息量。其中，包含有公众希望了解的良渚古城遗址的方方面面、良渚考古的历程、良渚时期古环境与动植物信息、代表了良渚文明最高等级墓地的反山王陵、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良渚高等级玉器、供应日常所需林林总总的良渚陶器……还有专门将良渚置于世界文明古国之林的中外文明比对，以及从媒体人角度看待良渚的妙趣横生的系列报道汇编。相信这套丛书会激起读者对良渚文明的兴趣，从而启发更多的人探索我们的历史。

可能很多人不禁要问：良渚文明和中华文明是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在近现代历史的观念里，我们是华夏儿女，我们不知道有一个“良渚”。其实，这不难理解。我们观念里的文明，是夏商以降、周秦汉唐传续至今的，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的国家文明，是“大一统”的中华文明。考古学界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的就是了解最初的文明是怎样的形态。因此，我们不该对最初的文明社会有过多的预设。在距今 5000 年的节点上，我们发现了良渚文明是一种区域性的文明。由此推及其他的区域，辽西可能存在红山文明，长江中游可能存在石家河文明，只是因为考古发现的局限，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些文明形态是否真实。良渚文明在距今 4300 年后渐渐没落了，但文明的因素却随着良渚玉器得到了有序的传承，影响力遍及九州。由此可见，区域性的文明实际上有全局性的影响力。

人类的迁徙、交往，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从未间断。不同规模、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人口流动，造成了文化与文化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区

域性的文明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目前来看，良渚文明是我们所能确证的中国最早文明，在这之后的 1000 多年，陶寺、石峁、二里头的相继繁荣，使得区域文明的重心不断地发生变化。在这个持续的过程中，礼制规范、等级社会模式、城市架构等文明因素不断地传承、交汇，直至夏商。其实，夏商两支文化也是不同地区各自演进发展所至，夏商的更替，其实也是两个区域性文明的轮流坐庄，只是此时的区域遍及更大的范围，此时的文明正在逐鹿中原。真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要从秦朝算起。这样看来，从良渚到商周，正是中华文明从区域性文明向大一统逐步汇聚的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万万不可将之割裂。

2019 年 5 月于良渚

文明和国家起源，是与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并列的世界考古三大战略性研究课题。从 1996—2000 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到 2001—2015 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两大国家战略性课题的展开，显示了国家层面对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重视，也都取得了丰富的阶段性成果。作为“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三大都邑性聚落综合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良渚古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考古发现是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基础，而我们对良渚社会的认识也是在 80 余年来的考古工作的基础上不断深化的。

1936 年施昕更最早发现良渚遗址时，学术界认为这只是山东龙山文化向南传播的一支。1959 年夏鼐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并成为学术界普遍的共识。但由于考古资料有限，当时学术界并未过多讨论良渚文化所处的社会阶段。

1973年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首次发现了随葬玉琮、玉璧的良渚文化的大墓，从此，以前被当作周汉时期制品的良渚玉器才得到了正确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江苏张陵山、寺墩，上海福泉山，尤其是浙江反山、瑶山陆续发现的良渚文化高等级墓葬，使我们认识到良渚社会分化的程度已经达到比较高的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莫角山大型台地遗址的发现及对“良渚遗址群”的探索^①，使良渚遗址的范围扩大到了42平方千米，学术界普遍认识到良渚社会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文明社会^②。

2004年，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良渚遗址的考古成了探源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2005年我国设立了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良渚遗址作为全国100处重点大遗址之一被列入保护项目库。

2006—2007年发现了围绕莫角山的良渚古城，随后积极展开持

① 王明达：《“良渚”遗址群概述》，余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良渚文化》，1987年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续的考古调查、发掘和勘探工作，良渚考古进入都邑考古的新阶段。2009—2013年，完成城内外10.8平方千米的全覆盖式勘探，确认了良渚古城城址区包括宫殿区、内城、外城三重，占地6.3平方千米。2009—2015年，通过调查和试掘，确认了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使良渚遗址的范围扩大到了约100平方千米。2016—2018年对莫角山宫殿区、钟家港古河道、姜家山贵族墓地、池中寺台地等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对城内的功能分区和格局有了明确的认识。

基于十余年的最新考古成果，可知无论从其宏大的规模，还是从城市体系的复杂性及其建筑的工程量等，良渚古城都不亚于同时期的古埃及、苏美尔和哈拉帕文明；高等级的墓葬与玉礼器的发现也证实了良渚时期已经存在森严的社会等级，甚至已经出现了统一的神灵信仰。如今学术界已普遍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和早期国家社会^①。

① 赵辉：《良渚的国家形态》，《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3期。Colin Renfrew, Bin Liu, "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society in China: the case of Liangzhu", *Antiquity*, 92, 364 (2018): 975-990. 科林·伦福儒、刘斌：《中国复杂社会的出现：以良渚为例》，陈明辉、朱叶菲、宋姝、姬翔、连蕙茹译，《南方文物》，2018年1期。

尽管在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国内外考古界对这两个概念一直没有达成比较一致的认识，为了更好地认识良渚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必要对此进行一些辨析。

什么是文明？

考古学意义的文化和文明，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是物质文化的集合，广义的文化则包括了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所显示的经济、社会、精神等多个层面。文明一般被认为是文化的高级形态，常常在物质文化中有强烈的显现，如出现城址、王陵、宫殿、神庙、礼器等，这是文明的狭义概念；广义的文明则包括城址、王陵、宫殿、神庙、礼器等“高等级”的物质文化现象及其背后所展现出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深层次的内涵。

文明常常被学者用来表示社会进步的状态，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包括摩尔根、恩格斯、柴尔德，以及国内的著名考古学前辈夏鼐、苏秉琦等。在他们看来，文明往往是国家的同义词。1877年，美国

人类学家摩尔根依据生活资料、政治、语言、家族、宗教、居住方式和建筑、财产等标准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社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摩尔根以“文明”来表示社会进化的最高状态^①。恩格斯完全继承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②。考古学家柴尔德发展了摩尔根和恩格斯的学说，并将其运用到考古学阐释中，他于1944年将文明定义为“专用于居住在城市里的人群……城市不仅必须有一定的规模，还要容纳至少一定数量不直接从渔猎或农业而是从次要的产业、贸易和其他职业获得生计的少数人口”^③。1950年，柴尔德根据古埃及、苏美尔、哈拉帕文明的相关考古资料，系统阐述了城市革命的理论，归纳了城市（在柴尔德看来，城市可以作为文明的同义词）的十项标准^④：庞大的人口数量，一般为数千到数万人；尽管大多数居民仍然是农民，但已经出现社会分工和手工业专门化；剩余财富交由

①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新译本），杨东莼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原书于1877年出版。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原著作于1884年出版。

③ 柴尔德：《考古学与社会进步》，潘艳译，《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原文发表于1944年。

④ 柴尔德：《城市革命》，陈洪波译，《考古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原文发表于1950年。

神祇或国王控制；存在规模巨大的神庙一类纪念性公共建筑，并往往附有大型粮仓；社会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祭司以神的名义操办礼仪，也掌管财产，王出现并作为民事管理者和军事首领；采用文字系统和数字符号；精确、预测性科学产生，如代数、几何学、天文学等；艺术专门化，出现专职的雕塑家、画家或印章雕刻家；存在经常的对外贸易，包括奢侈品和工业原料，用于工业生产或礼仪活动；出现地缘而非血缘的国家组织。柴尔德对文明的定义及城市（文明）的十标准论在国际考古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明的社会学内涵实际上可包括在上文所说的广义的文明概念之中，文明与文明社会实际上应该被视为两个概念，一个属文化学范畴，另一个则应归入社会学范畴。文明是一种高级的文化现象，而文明社会是出现了这些高级的文化现象的比较高层次的社会。

关于文明的标准问题，柴尔德的十标准说是比较全面的，基本上已经囊括了文明的各个层面的内涵。也有学者提出更简化的三标准说，比如 1958 年，克拉克洪在近东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文明社会必须满足以下三项中的两项：有 5000 以上居民的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这一观点被丹尼尔采纳，并通过其 1970 年出版的《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广为流传，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①。1984年，夏鼐作为当时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率先对文明的定义和判断标准进行了阐述，他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用‘文明’一词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中的这些标志以文字最为重要”^②。夏鼐根据殷墟的考古情况，提取出都市、文字、青铜器这三个文明的一般性特点，并根据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考古新成果，将中国文明的起源上推至二里岗文化乃至二里头晚期。夏鼐的三标准说与克拉克的三标准说有相似之处，但他根据殷墟等国内的考古成果，用青铜器替代了仪式中心。夏鼐的文明研究成果在国内引发了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其关于文明的三标准说也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

① Glyn Daniel, *The First Civilizations. The Archaeology of their Origins*, Thomas Y. Crowell Co., 1970。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华书局，2009年。该书是1983年夏鼐在日本的三次演讲集，1984年以日文出版，最早的中文版于198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苏秉琦、张忠培等学者在夏鼐的基础上，将文明提早到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 5000 年以前。苏秉琦指出，“中国早在 5000 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 1000 年”^①，张忠培也论述了公元前 3300—前 3200 年，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从父权家族的产生、社会分工与分化、聚落的分化、王权和神权的确立等方面论证当时以上几个区域已经跨入“文明门槛”^②。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相关考古学材料的证实。

关于文明的定义、相关标准的讨论以及国内外学者对良渚文明的定性，为我们归纳东亚文明的特质和标准奠定了基础。研究文明的道路可以归纳为“从文化到文明”，首先，从狭义的文化到狭义的文明，即从物质文化研究出发，探讨房址、墓葬、仪式场所、身份标志物等从简单向高级发展的历程，归纳文明形成的各种物质表象；在探

① 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 版于 1997 年在香港出版。

② 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考古、文明与历史》，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汉学讲座 1997 年，福元印刷事业有限公司，1999 年。